



大学译丛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Vincent Mosco

传播政治经济学

[加拿大] 文森特·莫斯科 著
胡春阳 黄红宇 姚建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传播政治经济学

〔加拿大〕文森特·莫斯可 著
胡春阳 黄红宇 姚建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播政治经济学/(加)莫斯科(Mosco, V.)著;胡春阳 黄红宇 姚建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6

(大学译丛)

书名原文: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ISBN 978-7-5327-6046-6

I. ①传… II. ①莫…②胡…③黄…④姚… III. ①传播学-政治
经济学 IV. ①G206②F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2359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Vincent Mosco

Copyright © 2009 by Sage Publication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图字: 09-2009-181号

传播政治经济学

文森特·莫斯科 著 胡春阳 黄红宇 等译

责任编辑/王巧贞 装帧设计/未氓设计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25 插页 2 字数 266,000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册

ISBN 978-7-5327-6046-6/G·180

定价: 3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调换。T: 0512-52218653

——批判传播译丛——

曹晋 Vincent Mosco 主编

本译丛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曹晋教授主持的
2011年教育部一般规划基金项目“传播新科技、知识劳工与市场经济转型”
(项目编号:11YJA860003)和2011年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
“新闻民工修辞的政治经济语境分析”(项目编号:11PJC034)的系列成果之一

译者导言

文 森特·莫斯科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第一版于1996年问世后，出现了两个中译本，一个是冯建三翻译的台湾版（1998），一个是胡正荣翻译的大陆版（2001）。如今，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是莫斯科于2009年修订出版的第二版的中译本。

该书是多门类的社会科学的知识图谱，那些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激动人心的名字，一次次激越地回响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天空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笛卡儿，黑格尔，马克思，葛兰西，卢卡奇，涂尔干，霍加特，威廉姆斯，汤普森，霍尔，杰弗逊，威利斯，吉登斯……他们试图用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以及文化批判等视角去理解社会变迁，尤其是理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

正是在这样广阔而厚实的知识基础上，莫斯科开始了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开拓之旅。那些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里的奠基先锋人物以及当代领军人物对当代最新和最有争议的问题提出的真知灼见，使莫斯科洞烛幽微：斯迈思，赫伯特·席勒，哈洛伦，古拜克，瓦斯科，戈尔丁，默多克，加纳姆，奥斯卡·甘地，米汉，彭达库（Manjunath Pendakur），丹·席勒……他们以及莫斯科本人都试图理解，在信息化时代权力是如何在所有媒介中运作的：从报纸到 Facebook，媒介权力如

何与全球化、社会阶级、种族、社会性别和监管交织在一起，以及信息劳工的阶层分化及其在权力运作中的地位，并致力于整合批判理论中的诸多关键对话，以便对信息时代的社会与权力变迁做出更全面的分析。

在传播学研究中，政治经济学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视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奠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紧随其后的几年直到1980年，奠基于北美，但如今，研究力量和研究领域扩散到全球。正如莫斯科指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当代有五个发展潮流：该领域的全球化，对历史新形式的日益增长的关注，对抵制立场的日益强调（尤其是女性主义和劳动），聚焦新媒介产生的突出社会问题（比如，知识产权的控制，电子监管以及网络经济的重要性）以及媒介变革和民主（比如，与政治经济传统相关联的社会行动的增长）。这些主题使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朝气蓬勃。

所有政治经济学派别还共享有四个奠基理念：社会变革和历史、社会整体、道德哲学和实践。它们关注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一个新型社会（比如说，是资本主义或仅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或可被叫做信息资本主义？新兴的信息传播技术是否太具革新性而导致其根本上的重构，而这种重构将导致资本主义的根本质变乃至分崩离析？同时，它们也热心探究社会的整体体系（或者说社会关系的总体），比如，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领域；它们还关注有助于产生社会行为的价值观和关注那些应该引导社会改变的努力的道德原则；它们强调社会实践性，也就是说，它们反对传统学院派这样的立场：将研究领域和参与社会分离，将研究者和社会行动者分离。

商品化、空间化和结构化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基本出发点的三个进程。首先，要分析人们的传播行为是怎样变成能够带来利润的产品，以及人们是如何抵制这个过程的；其次，要分析资本是怎样利用大众媒介和传播技术来克服地理空间所造成的障碍，并由此产生了二律背反：全球化使跨国企业权力延伸的同时，也产生了其宿敌——民族主

义，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比如，本·拉登为基地组织所做的，不过是推行或者直接复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工业世界中大部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所采取的有效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法；最后，要分析围绕社会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社会关系是如何得以组织的。因此，该书的结论是：重返阶级权力，因为阶级权力一直以来都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有核心位置。

对于观察信息社会的社会组织及其变迁，莫斯可既不满意正统经济学科或新古典主义的方式，也不满意文化研究或公共选择理论。因为经济学倾向于对历史动力和社会变迁弃之不顾，倾向于忽视权力同财富的关系，由此忽视制度控制市场的权力，只对社会提供一般的、静态的解释；新古典主义则将大部分“政治”从“政治经济”里排除，政府和大公司的政策分析家和政策制定者全都是该学科最聪明、最机敏的从业者；而公共选择理论有两种偏向——或过分强调政治方面，或过分强调经济方面；而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分水岭在于“劳动分析”还是“文化分析”，是“结构的”还是“互动论”的方法。因此，莫斯可以为政治经济学与公共选择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论之间的对话而架设新桥为该书作了结语。基于此，莫斯可对知识领域的团结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良好期待：不管政治经济学和它的相邻学科有什么分歧，我们的研究过程应当使知识分子和文化生产者走到一起，而不是相互疏离。对于如何运用传播来实现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创建民主传播系统的运动，我们应该建立共同的理解，进而促进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争取使所有人都获得更大福利。

莫斯可的研究逼迫我们必须直面当下两个切时的话题。

一是，面对当代中国激烈的社会变迁和媒介变革的此情此景，我们如何做传播研究？“仅仅是经济（比如，金钱是推动媒介的唯一力量）或仅仅是文化（比如，人民的价值观塑造了媒介）都无法像魔钥似地开启我们对传播的理解”（第七章第二段）。媒介事业难道不是一度被人们等同为经营或者技术吗？莫斯可提醒人们，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

成功，也是因为它通过提供加强资本主义的信息、建议和政策，为权力服务。这样，将经济学视为一种权力体系至少同样重要。要想理解那种体系并建议改革它的方式，现在，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政治经济学。

二是，巧合的是，莫斯科在 2009 年新版中提到，30 年前的 1979 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的三厘岛核事故发生的那个周末，由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协会政治经济学部召开的“工作例会”云集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先锋人物，此举改变了他的学术轨迹。今天，当日本的核泄漏乃至扩散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威胁和话题时，改变世界、改变媒介体系难道不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吗？

现在，就是现在，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政治经济学。

该书的原版序言、中文版序言，第四、五、六章为胡春阳翻译，校译和统稿也由胡春阳进行；第一章由吴冬妮、胡春阳翻译；第二、三、七章为黄红宇博士翻译；第八、九、十章为姚建华博士翻译。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叠床架屋之晦涩，指鹿为马之疏漏，在所难免。但我们都是抱着极为严肃勤恳之态度，无惧尺方之枯燥，任韶华以飘零，勇猛精进。

胡春阳

2011 年 3 月

于香港海滨花园海宁阁

中文版(第二版)序言

我非常高兴看到《传播政治经济学》新版中文版的出版，正是中国给我的修订本赋予了灵感。过去十年，我很荣幸几次访问中国，人们对政治经济学以及如何应用政治经济学去理解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媒介和传播体系的浓厚兴趣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并让我感到惭愧。师生们来听我的讲座，热切地提出诸多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在我演讲后，他们簇拥着我，继续谈论着上海、北京、香港以及其他城市的街道。当他们带着我在一个个城市之间漫游时，他们询问我对以下问题的看法：新闻业中的劳动过程，媒介的私有和国有以及民主传播的意义。曾经有个学生带着我去旅游，他还随身带着一本写满标签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他希望能够从我这里得到资本论如何应用于解释媒介劳工问题的答案，甚至在他为我介绍一个个旅游景点时，他也没有忘记向我发问。

如此程度的兴趣当然感染了我，但也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在整个亚洲大学得到发展。于是，我决定写作1996年版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更新版，而1996年版已经有两个中文版本。由于以下一些原因，出新版必然是一个挑战性任务：在第一版和我开始考虑写作第二版之间，十年转瞬即逝。任何新版都需要大规模的修订和更新，第一版出版一到两年后发生的巨大变化都在新版中反映出来；第二，

大量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在这些版本之间问世，包括来自亚洲的主要贡献，新版本不得不反映亚洲的贡献。亚洲的一些研究挑战了原版中的关键观念。因此，写新版不光是旧瓶装新酒，还要对旧瓶（旧的结构）本身进行重新思考。然而，每每当我在写作新版这个艰难任务面前热情消退时，我就想起我对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那些访问，如果新版提供了这个领域的改版地图并考虑了自 1996 年以来的显著发展，那么，许多学生和教师的思考、研究和写作也许可能从中获得启发。这些回忆推动我按时完成了计划。

第二版有很多新观念，但也还保留了旧版的精华部分。包括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与关键特征，在这里概括一下很有必要。政治经济学是社会关系的研究，尤其是权力关系的研究，各种权力关系彼此建构着资源（包括传播资源）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这个定义有实用价值，因为它引起我们对传播产业运作的关注。比如，媒介产品如何从诸如电影工厂等制作者链条流动到批发商、零售商以及最后到消费者手中，消费者购买、下载产品，而其注意力反哺了新的生产过程。但是，就其最为普遍和雄心勃勃的定义来说——政治经济学就是对社会生活的控制（control）和存在（survival）的研究，政治经济学远比标准商业模式要深刻得多。控制特指在一种持续变化的环境中，社会群体成员的内部组织；存在意味着人们如何在同样动态的语境中，生产着为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条件。控制过程广义地讲是政治性的，因为这些过程包含着一个社会的社会关系的组织；而存在过程主要是经济性的，因为这些过程牵涉到生产和再生产是如何进行的。总体来讲，存在和控制需要置于历史条件的语境中。

因此，政治经济学始终被置于理解社会变迁和历史转型目标的前沿。对于 18 世纪和 19 世纪早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来说，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政治经济学意味着理解资本主义大革命，这个社会巨变把主要奠基于农业劳动的社会转变为商业的、制造业的并最终是工业的社会。对于卡尔·马克思来说，

政治经济学意味着检视资本主义的动态力量以及资本主义和其他政治经济组织的形式之间的关系，最终是为了理解社会变迁，而他认为，这种社会变迁最终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正统的经济学家在19世纪晚期开始联合打击政治经济学，他们倾向于把对历史动力和社会变迁的关注弃之不顾，以便把政治经济学转化为经济科学，而这种经济科学像物理科学一样，将提供一般的、静态的解释。根据这种观点，经济学家能够精确解释购买者和销售者是如何联合进行市场定价的，但是却不考虑为定价创造条件的广泛的社会与经济变迁过程。当代政治经济学者占据着与成为经济学主流毫不相干的位置，他们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处理社会变迁和变革主题的传统，在当代，他们聚焦于诸如工业向服务与信息经济转型的领域。有关大众传媒、信息和传播技术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因为被这些领域的研究所包围的工业是创造当代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力量。

同时，政治经济学的特征是检视社会整体或者叫社会关系的总体，这些社会关系的总体组成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从亚当·斯密开始，他把社会生活理解为并非由学科界限所约束的——而在今天，学科分界标志着学术生活，经由马克思，再到当代制度的、保守主义的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始终如一地以建构政治和经济的统一为目标，他们解释政治和经济的彼此影响以及它们与广泛的社会和符号行为领域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者要问的是：权力和财富的关系如何？它们如何建构和型塑我们的大众传媒、信息、文化和娱乐体系？

政治经济学也因其忠诚于道德哲学而著称，道德哲学被理解为既是关注有助于创造社会行为的价值观，也关注那些应该成为引导改变社会行为而进行的奋斗的道德准则。对于亚当·斯密来说，比起他那本更著名的《国富论》，他更钟情于《道德情操论》。在《道德情操论》里，他指出，道德哲学意味着理解诸如自利、物质主义和个人自

由这样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推动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对马克思来说，道德哲学就是意识到人类劳动中个人和社会价值的驱动力和把劳动简化为市场商品的驱动力之间的行进式争斗。这就超越了政治领域而进入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因为政治领域只保障了参与政府的权力，而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民主的支持者呼吁收入更为均等，对普遍的教育获得，对各种形式的文化生产的公共参与，以及对表达和自由发表观念的权力的保障。

根据这种观点，社会实践，或者叫思与行的根本统一也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有中心地位。具体来说，它反对传统的学术立场，因为该立场把研究领域和社会干预领域分裂；政治经济学者在一种可以追根溯源到古代为领导人出谋划策的传统中，始终把知识生活看作是社会变革的一种形式，把社会干预看作是学习的一种形式。尽管他们对于社会干预的特征各执己见，从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支持作为一种人口控制方式的结扎，到马克思呼吁劳工在革命中实现自身，都是如此，但政治经济学者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即研究和行动之间的分离是人为的，必须被克服。

政治经济学在传播研究中是一种充满活力的知识传统，这种知识传统回应物质条件的变迁以及知识生活的巨变，中国在近些年已经经历了这些巨变。本书新版通过论述传播政治经济学当代重要趋势，回应了这些发展。这些思潮包括政治经济研究的全球化以及重新强调市民和劳工如何影响传播的历史；这些思潮也包括向另类立场的转向，尤其是女性主义和劳动，转向的重点是从老媒介到新社会媒介以及对媒介的政治参与的扩展。这些思考无一不是全新的，而是建立在已经存在的知识上，只不过它们原先被埋藏在该领域的主流潮流之下。如该书所例证的，华人学者，无论是中国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为这些思潮作出了贡献，这是我在亚洲之旅中已经乐见的事实。最终，政治经济学传统，这种一度主要扎根于北美和欧洲的学术传统现在已是全球化的和跨文化的，包括来自中国和关于中国以及整个亚洲的意义深远的

贡献。

有很多学者我需要感谢，因为他们使这个翻译本问世成为可能，但我想特别感谢复旦大学的曹晋教授，她以许多重要的方式为该书作出了贡献，包括邀请我到中国讲课，翻译我的讲稿和文章，激发关于中国历史及其当代社会转型的对话，以及对该项目的支持。我还要感谢胡春阳教授和黄红宇博士，以及姚建华博士的辛勤翻译，胡春阳教授的认真统稿与精心核对保证了翻译文本的品质。同时，没有曹晋教授的一贯支持，这个中文版的问世必无可能。我也要谢谢她把她的学生姚建华推荐到我这里，姚将完成关于中国信息劳工的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这是对该领域全球化的进一步贡献。

文森特·莫斯科

序 言

《传播政治经济学》第二版对1996年版作了充分的修改和补充。由于这个领域在过去十年得到充分发展，于是我决定写新版书。新版本将有机会阐述这些新发展且一并评述第一版。除了论述新研究成果，我的目标还将是深化理解那些给予该领域多年发展活力的持续主题，论述那些使这个领域复兴的新成果。为此，将以一种通俗易懂但又体现语言的精确性的方式来进行。以下就是一些重要的具体的变化。

有人认为对政治经济学路径作一个简洁概述是必要的，而概述也可以识别该领域的关键读本和文章。于是，本书开头一章就是概览。我也认为这样做可以把大的章节分为小的章节，使书更加平易近人。因此，我用了较长篇幅阐述政治经济学一般领域，把它分为两章。第二章定义政治经济学路径，并论述其主要特征。第三章阐述主要思想流派，我用了一个长篇幅来图绘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及其当下状态。第四章开头部分是传播的意义，传播意义使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的考察更为具体（而第一版没有这么做），这一章继续阐述影响这个领域的社会 and 知识要素。第五章检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历史。

第六章包含一个全新的章节，阐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当下的五个潮流。这些潮流包括该领域的全球化，对历史新形式的日益增长的关

注，对抵制立场的日益强调(尤其是女性主义和劳动)，聚焦新媒介(尤其是因特网)，以及媒介变革和民主。这些主题使整本书朝气蓬勃。但我又认为把它们整合为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的一章会有用些。

第七章到第十章继承第一版的一般模式，但是有一些关键变化。例如，第七章开头是一个新的部分，是关于建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的。这一章后面继续检视商品化过程及对它的抵制。第八章是关于空间化的，重点强调了全球化概念及其与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关系。第九章浓墨重彩于劳动以及在社会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研究中的差异。最后，在第十章除了强调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较为紧密关系，还为政治经济学厘清了两个新的主要挑战：与科学和技术研究合流(包括参与者网络理论)，使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关系争议加剧。

在此感谢所有帮助我写作该书的人似乎不太可能。这些观念伴随我已经六十年了，我在知识上浸润于它们已经四十年。我再次谢谢那些在第一版鸣谢中提到的所有的人，这些人中，我尤其要提到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詹姆斯·哈洛伦(James Halloran)，托马斯·古拜克(Thomas Guback)，珍妮特·瓦斯科(Janet Wasko)，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尼古拉斯·加纳姆(Nicholas Garnham)，他们使我在第一版时正式采访他们如愿以偿。遗憾的是，前三者已经不再与我们同在，但他们的研究以及他们对批评研究的担当风范将长存于世。

2009年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核事故——宾夕法尼亚的三厘岛核事故发生的三十周年。当我在事故发生的周末飞到该州时，我想知道是否我的生活将发生彻底改变。我很快认识到：会的！但并不是因为核工厂接近垮台。航班把我从华盛顿带到伊利诺伊，在华盛顿我在乔治敦大学教社会学。在伊利诺伊大学，其时正在召开由国际大众传播研

究协会政治经济学部的“工作例会”。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遇到斯迈思，托马斯·古拜克，珍妮特·瓦斯科，奥斯卡·甘地(Oscar Gandy)，艾琳·米汉(Eileen Meehan)以及彭达库。如本书所阐述的，他们每一个人都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富有意义的贡献。那个周末，我还遇到弗雷德·菲杰斯(Fred Fejes)，珍妮弗·斯莱克(Jennifer Slack)，萨里·托马斯(Sari Thomas)，卡罗琳·马文(Carolyn Marvin)，蒂莫西·海伊(Timothy Haight)等人，他们的研究在这些年丰富了批判的传播研究。因为这个周末为我提供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故乡，的确可以说改变了我的生活。因此，我向那些三十年前和我分享了那个充满难忘的知识兴奋以及环境灾难的周末的人们致敬。还有你们中大多数在那以后丰富了我的生活的人们。

自从第一版问世，我享受了在诸多地方讲授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机遇。我愿意特别提到几个我在大陆和台湾遇到的人给予特别感谢，他们一直是那些最渴望学习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人。本书第一版有两个中文版，一个是台湾版，一个是大陆版。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已访问过这两个地方好几次并就这个主题作过演讲。感谢这些机构的学生和教员对我的慷慨欢迎和对该话题做的激烈讨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国立政治大学”（台湾），“国立中正大学”（台湾），上海大学，浙江大学，浙江传媒大学。我也对有机会就传播政治经济学发表演讲心怀感谢，尤其是在2007年关于媒介民主的北京论坛上的演讲。我将永远珍藏在人民大会堂做演讲时的记忆。确实，无论何时当我完成新版本的动机减弱时，我的思绪就立即回到演讲厅、餐厅、车子里和街道上那些激烈的讨论，我就总会重振精神回到工作状态。

我也感谢如下机构的支持：加拿大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加拿大研究讲座项目以及加拿大皇后大学。

我愿意在结束序言之际感谢那些在我准备第二版时为我尤其助力的人。首先，我向丹·席勒(Dan Schiller)感谢致意，我在“三厘岛”

事件后与他相遇，后来我和他在费城、圣地亚哥、渥太华、金斯顿、温哥华、纽约、华盛顿、厄巴纳、伊利诺伊、博尔德、科罗拉多、安卡拉、北京、巴黎以及其他地方有了近三十年的对话。无论在哪个城市，我们的聚会都是从评论最新的著作到争论政治经济学，包括历史与理论，工具主义和结构主义对权力的理解，资本主义的弹性和压力，改良与革命等的价值。这些相遇经常导致我们彼此采取对方的立场，我们论战的结局多半是同意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孩子。无论我们那天对问题的立场如何，我能够肯定我要感谢丹的太多，因为他丰富了我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解。

我也想谢谢两个对我这个计划提供了宝贵帮助的学生。当我来到那时的研究助手而现在正在约克大学读博士的戴维·拉文(David Lavin)面前，并请求他找到第一版自1996年起关于每一个主题的每项内容时，他没有胆怯畏难，相反，他拿回了注释过的参考文献以及该书每个章节的几箱材料。谢谢你，戴维，谢谢你最初的援手，我知道这些帮助将是你自己毕生对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贡献。我也想谢谢安德鲁·史蒂文斯(Andrew Stevens)——我现在在皇后大学的博士生，他把1996年版的原稿做成表格，以便我开展新版本写作。安德鲁也对新版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并帮我穿越参考文献的丛林。谢谢你，安德鲁，我知道你将来也会大有作为。

最后，我想谢谢凯瑟琳·麦克切(Catherine McKerche)——我的超过三十年的生活伴侣以及过去六年我研究的伴侣。由于你克服了生活中的最大挑战，你和我共同完成了关于传播工业中的劳工的三本书，你和我穿越欧洲、中国、美国和加拿大，行走得精疲力竭，就传播政治经济学做过激烈讨论。为所有的这一切，我要谢谢你。

文森特·莫斯科